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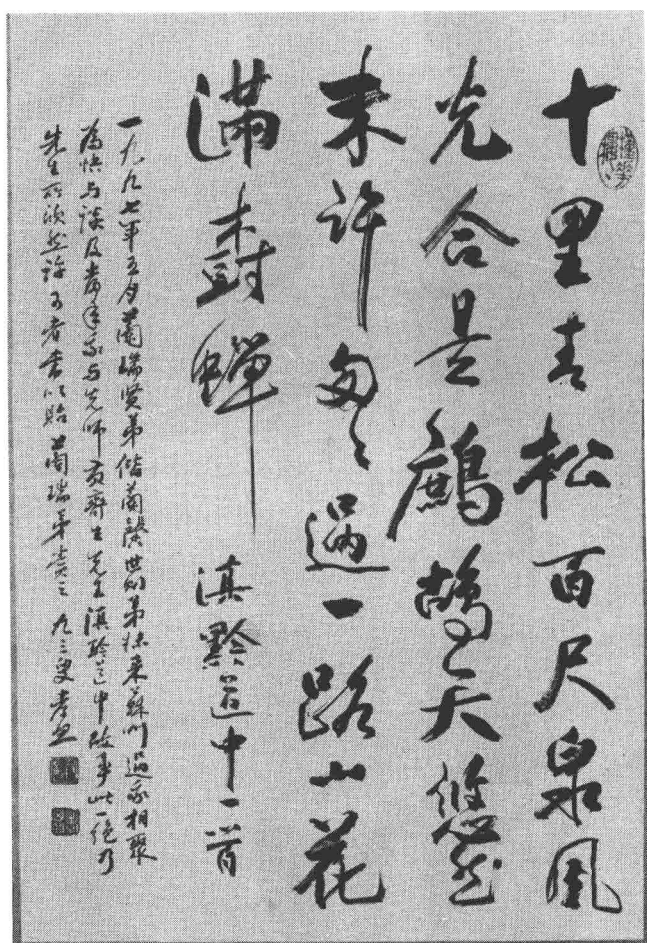


# 风光合是鹧鸪天

冯兰瑞 著

# 风光合是鹧鸪天

冯兰瑞 著



注：1997 冯兰瑞赴苏州看望 93 岁高龄的谢孝思先生，临别谢先生送冯兰瑞一幅字，“十里青松百尺泉，风光合是鹁鸪天。悠然未许匆匆过，一路山花满树蝉。”

## 前 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十几年间我经历的几桩历史事件的记实。这些事件不应被遗忘，它也不应属于我个人，而是那个年代我国思想理论界部分知识分子崎岖坎坷曲折前进的历程。我作为当事人应为这段历史留下一个真实可靠的文本。这也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

上世纪最后二十几年，是我国历尽劫难之后，艰难地走上市场经济轨道，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20年，也是理论风云变幻的20年。

这个时期，我的学术活动和研究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平坦的。基于人生无非是追求的信念，虽然明知前路艰险，难免会有风雨雷电，却坚持知难而进。正如书名所示：“风光合是鹧鸪天”<sup>①</sup>。所幸最终还是走过来了。

到了新世纪，不觉已进入耄耋之年。回首人生，“旧雨新交遍天下”，晚景如霞。原想尘封往事，不说也罢。

---

① 1979年我专程往苏州探望吾师谢孝思先生，返京前先生以一幅墨宝赠别，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先生与黄齐生先生颠沛于滇黔途中所作的一首七律。诗见扉页。先生以此诗相赠，是一种鼓励，学生也常以此自勉。

几篇回忆文章，让它长眠筐中可也。

孰料日前阅读，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书在前言中写道：上世纪最后 20 年是平静的 20 年，可以安心地读书和工作了。（大意）这话令我深为感吧！有人或因对历史无知或健忘或有意粉饰太平，有意无意地将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光明面夸大而对阴暗面尽量遮掩，只见莺歌燕舞，一片昇平，忽略了存在于平静沧海万顷碧波下的险滩暗礁，甚至 1989 年“六四”那场风波在某些人笔下也似乎不曾发生过。恰似辛弃疾在《鹧鸪天·送别》一词中说的：“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对景思情，真是因人而异啊！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因此，决定将这几篇记实文章付印。

这本书的产生，要感谢一些老朋友的鼓励、出版界朋友的支持。这些文章写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有三篇曾公开发表，由于某种原因和篇幅关系而被压缩，收入此书时恢复了原貌。书中涉及的人和事，如发现与事实有出入，恳望识者不吝指正。

作 者

2003 年 11 月倚竹斋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一、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 .....                                                             | 1  |
| 二、1979 年“阶段风波”的前前后后 .....                                                        | 20 |
| 附 录 .....                                                                        | 62 |
| 1、苏绍智冯兰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79 年第 5 期、《新华日报——文摘版》1979 年第 10 期（摘要）       |    |
| 2、1977.5.5《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人民出版社 1978 年单行本第 6~9 页（摘录）                |    |
| 3、胡乔木在马列所等五个研究所汇报会上的讲话（摘要）                                                       |    |
| 4、《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第 27~32 页                                         |    |
| 5、《也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与苏绍智冯兰瑞商榷》《经济研究》1979 年第 8 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 年第 10 期（摘要） |    |
|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的历史回顾 .....                                                          | 83 |

|                               |     |
|-------------------------------|-----|
| 四、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 .....         | 90  |
| 五、马列所的危机 .....                | 115 |
| 六、十年辉煌 十年沧桑                   |     |
| ——回忆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 .....          | 132 |
| 附 录 .....                     | 187 |
| 1、1989年2月24日中国经团联秘书长冯兰瑞致胡绳院长信 |     |
| 2、小统计：经济科学出版社获全国性图书奖          |     |
| 3、中国经团联第一届临时党组成员会外活动的部分事实     |     |
| 七、“马丁文章事件”始末 .....            | 193 |
| 附 录 .....                     | 201 |
| 1、1985.11.2《工人日报》马丁：          |     |
| 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                |     |
| 2、1985.12.19 纽约《中报》：扬弃学术功利主义  |     |
| 3、1986.1.25《红旗》杂志《理论交流》第二期：   |     |
| 纽约《中报》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               |     |
| 4、1986.2.21《国内动态清样》：          |     |
| 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    |     |
| 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                 |     |
| 5、1986.3.4《经济参考》：             |     |
| 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     |     |
| 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                     |     |
| 6、关于马丁文章的座谈会纪要                |     |
| 后 记 .....                     | 225 |

## 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1975年7月成立，存在了四年。到1979年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合并，至今正好20年。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社会严重动乱，经济濒临崩溃，文化被摧毁，党的各级组织被破坏，干部被打倒，一切理论都被颠倒。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受命主持党中央工作，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由于当时党中央还在“四人帮”控制下，邓小平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要和“四人帮”斗争，这个机构只能设在国务院，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在如此艰险复杂的环境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所担负的任务之繁重和艰巨不难想像，其所作出的贡献也是相当突出的。事实上，期间历经的多次政治运动中，政研室都处在“风口浪头”上，和“四人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做过许多工作，写过不少文章。正因此，在当时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单位。我就在这个单位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但是，由于其历史很短，当时所处环境很特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字很少公开见于报端。社会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文革结束前后国务院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重要机构。因此，将我所亲历的情况扼要地写下来，作为纪念，也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参考，看来还是有必要。

### 初建时期 写“论总纲”

1975年7月我被分配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在此之前，我

曾参与编辑于光远主编的《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书。那几年西方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政研室成立以后我去那里，起先也是在国际组收集研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资料。

政研室的领导一共有七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曾是康生的秘书。

政研室的研究机构，除国际组外，还有国内组和理论组，其余的记不清了。

政研室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面，一幢普通楼房的二层楼，会议室就在靠近的武成殿。这时为了修建中央领导的办公大楼和地下室地道，中南海的古典建筑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老的建筑已不多。我们能在武成殿里开会算是很幸运的。

政研室建立初期，邓小平经常找室里的几位负责人谈论形势和工作，他们也经常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上班先到武成殿，听几位头头讲邓小平同他们谈话中可传达的内容，布置工作和交换一些意见。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资料，写一系列文章；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所的工作由于光远负责。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论总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编写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 1975 年的一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致不错。《论总纲》是胡、于、邓几位室领导组织写作的，我没有参加。据我所知，《论总纲》曾数易其稿，胡绩伟、苏沛、滕文生、龚育之、吴冷西都先后参加过写作。第一二稿由胡绩伟主持写出，最后一稿由邓力群来主持写。从写作过程看，《论总纲》一文是集体的作品。“批邓”

当中，邓力群承担了写《论总纲》的责任，没有上推下卸，表现不错。但因此就认定文章是自己一个人写的，编入个人的文集，又没有加以说明。这种做法就不大好。

《论总纲》一开头就说，“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遵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 25 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第一步，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接着提出了以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和“四人帮”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立。这篇约 16000 字的大文章无异是一发对“四人帮”的重型炮弹，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是意料中的。不过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论总纲》10 月份排印出来，还未正式发表，11 月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批“三株大毒草”，胡乔木等就只有检讨的份了。

## **“批邓”反“右倾翻案”**

### **胡乔木首当其冲**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没有多久，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室内头一个跳出来的是个年轻人，叫农伟雄。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运动开始后，他给姚文元写了封信揭发政研室。姚文元给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农伟雄拿到了“令箭”，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来。一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乔木。

政研室开了多次批判大会，主要批判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现是好的，只有很少几个“积极”分子。可叹的是几个室领导中也有人反对农伟雄不是抵制而是跟着跑。例如造反派追问胡乔木这个期间同邓小平的关系，见过几次面，谈什么内

容。胡乔木说不出。吴冷西几次发言，说胡乔木怎样捂盖子，批胡的态度。又在批判会上一条一条地揭发，历数胡乔木哪一天、什么时候去邓小平那里谈了什么，排时间、讲次数，迫使胡乔木不得不承认。于是，也排了顺序，揭发他与邓小平接触若干次的情况。熊复很少到政研室，“批邓”中倒很积极，在会上也揭发胡乔木，说胡乔木要他找文艺界某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是什么“捉刀代笔”，胡乔木还要求文字要“密密疏疏，疏疏密密，密中有疏，疏中有密”，故弄玄虚。

但大多数人对胡乔木是同情的。胡乔木年纪大了，身体本来不太好，我们担心他会被整垮。室里原来有公务员帮他打开水，运动开始后他只能自己拎着暖壶吃力地下楼去打开水。一天，我正好碰见，于心不忍，就去接他手中的壶想帮他的忙，他连连说“不，不”，非要自己去打不可。农伟雄给胡乔木加的“罪名”主要是反对毛主席。一次，在原中宣部图书馆后楼里开批判会，我替胡乔木辩护说：乔木同志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我记得他写过一首诗，说“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这样的感情，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

于光远、邓力群也是批判对象。邓力群比较会应付。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每次讲一点，保留一点，要是一次讲完了，下次就没有可讲的了。于光远就不是这样，他是个学者，不会作假。

政研室本来就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大家也是暗中抵制。1976年春节我生了一场病，就此请了病假，一直拖到4月下旬。后来医院不再开假条，只好去上班。支书朱佳木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说：你一张大字报都不写，不太好，还是写一张吧。我看他是好意劝我，我就写了几句空空洞洞的话，挂在办公楼走廊专为挂大字报拉的绳子上，才过一天我就将它撕掉了。

## “四人帮”垮台 政研室奋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邓小平和胡乔木都

被排斥在外，不让参加。胡乔木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参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个小型追悼会。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在抄江青的家时发现了这封信，才知道此信除要求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外，还是一封给江青的“效忠信”。

这个时期我很闭塞，“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是第二天才知道的。1976年10月7日这天晚上12点，李昌已经钻到大写字台下面的地铺上睡了（因防地震都不敢睡床）。这时忽然响起电话铃，我一听，是于光远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还让李昌也一起去。我感到可能有什么要紧事，就叫李昌起来穿上衣服，一起步行去于家。

我们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么事这样紧急。李昌在中科院为协助胡耀邦起草“三株大毒草”之一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挨了多次批斗。这时他心里有些不安，说是否科学院又要开大会斗他了。我说，不要多想，到光远家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好在从东总布胡同到史家胡同光远家路不远，很快就到了。

进得大门一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灯火通明，正和夫人孟苏在等我们。一见面光远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这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四人帮”是想到了的，还有一个谁？光远说是毛远新。他还讲了一些所知道的过程。我们回到家已是凌晨，兴奋得没法合眼。李昌的包袱也卸下了。第二天，我到政研室，同志们也都很高兴，马上组织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久，室领导决定办一个内部刊物《文稿选》，刊登同志们的文章。

1976年12月，《红旗》杂志汝信等同志来约稿，请我们写纪念宣传工作会议讲话20周年的文章。过了几天，又来电话说，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是耿飚）将我们《文稿选》第2期的《“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以下简称《百花》）一文推荐给《红旗》。《红旗》还派了陈（？）、谭家健来政研室谈对《百花》一文的修改意见。有些意见我们表示不同意。1月18日至24日《红旗》接连送来三次排出的清样。最后一稿是总编辑修改的。政研室对《红旗》的意见很重

视，于光远亲自主持会议，郑重研究讨论之后认为，稿子删改有许多不妥，我们不能接受。例如《百花》一文中列举了“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一些有关事实被删掉；文中指出“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目的是要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政；砍掉百花齐放不仅是文艺问题、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等等，都被删掉了。《红旗》几次来人要求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们一再研究，感到有困难。于光远说：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好改，我们这篇文章就不要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给《红旗》写稿子。前面提到，此稿是宣传口推荐给《红旗》的。耿飚说这篇文章很好，可以用。耿还批示说改了以后送他转送中央审查。2月下旬，我们收到《红旗》送来的送审稿清样。据来人讲，此送审稿已印5份清样送宣传口。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红旗》还提出一个署名问题。当时各单位发表文章都用本单位大批判组的名义，但他们说政研室发表文章不要用本单位大批判组署名。我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提出请《红旗》杂志解释一下。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解释。我们也不好坚持一定要用“国务院政研室大批组”署名，就另拟了一个笔名叫“向群”，决定这个时期政研室发表文章都署名“向群”。

关于《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文，1977年3月12日，《红旗》来电话要这篇文章，我答复研究一下。20日我将此稿送去，在邢方群处与王笑一起谈妥，如第4期《红旗》不用，请他们立即通知我，我们可以给报社。他们对文章提了些意见，23日我将修改稿再送《红旗》，结果《红旗》第4期没有用，什么原因也问不出来。这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来要这篇文章，我们就给了《人民日报》。以后《红旗》又来电话还是要这篇稿，我说我们已给报社，不好说了。你们要，可直接找报社。以后，这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于5月27日在《人民日报》刊出，署名向群。

当时《文稿选》刊载过许多文章，不少被全国性报刊发表，如：《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人民日报》）、《张春桥反军的一个铁证》、《刁小三与资产阶级法权》（《解放军报》）

等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给政研室写过不止一封感谢信，感谢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文章，同时，赠送刊载文章的当天报纸30份。《人民日报》一再表示敬意并叮嘱已经应允的文章早日写成。《解放军报》来信感谢，除送刊登我们文章的报纸外，还送了《鲁迅佚文集》16本，我将来信及书给领导过目后，分发给文章作者、图书馆、印刷厂及有关人员，来信存档。

当时室内同志写批“四人帮”的文章不少，都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印刷厂排印；出版《文稿选》，也要与印刷厂打交道；还要与报刊联系，事情不少，室领导就给我个对外联系的任务。所以，除参加集体写作外，政研室写的稿件都由我签发印厂，并负责对外发稿和报刊商谈修改等事宜。因此，《百花》一文与《红旗》来往争执的过程我都清楚。

## 好景不长 政研室要撤销

1977年春，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政研室要撤销。室里人心惶惶。3月8日妇女节那天，我们听了正式传达：国务院已经决定撤销政治研究室。在4月1日政研室全体人员大会上，邓力群详细介绍了3月4日国务院吴庆彤、贾鲁峰和郭X（名字当时没记下来）等三人找于光远、邓力群、胡绳三人谈关于撤销政研室的情况。下面是邓力群介绍的内容大意：

吴庆彤说，胡乔木主要是这一段政研室与上边的联系人，实际工作在于光远、邓力群做的。吴庆彤念了国务院值班室政工组写给李先念、纪登奎<sup>①</sup>的一个请示报告。原来，这个撤销政研室的请示报告就是根据李先念、纪登奎的指示写的，主要是提出撤销后处理具体问题的意见：（1）人员问题。除了一部分到毛著办公室，于光远、邓力群另有工作安排外、其他同志原则上从哪个单位来回到哪个单位去。还

---

<sup>①</sup> 当时李先念、纪登奎和后面提到的陈锡联都是国务院副总理。

附了一个名单；(2)农伟雄的问题。由政研室作出结论，然后退回新华社；(3)文书档案清理后，交国务院值班室接收；(4)图书馆退回给《红旗》代管。李先念、纪登奎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请华主席、叶副主席、吴德、陈锡联传阅批示。华、叶等四位都画了圈，汪东兴批示：图书馆交毛著办公室。对个别同志的安排，汪也提了改动意见。

吴庆彤说，撤销政研室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谈过，并交代从4月1日到6月底，政研室应该把要做的事都做完。例如，工作总结、鉴定等等，6月底结束一切工作。吴庆彤解释说，政研室1975年成立时是必要的。那时的舆论阵地、宣传工具，都控制在“四人帮”手里，现在形势变了，这些已夺回到中央手里，组织机构就撤销了。

吴庆彤讲完后，征求于光远、邓力群、胡绳的意见。邓力群表示撤销政研室没有思想准备，但是上面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他说：有一个问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给政研室戴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其中之一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这就不仅否定了政研室，也涉及邓小平，还有国务院其他同志。所以，希望能对政研室做个正确的评价，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使得同志们离开政研室的时候不背包袱，能够挺起腰来。于光远说：人员处理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工作岗位上调来的，回去仍有工作岗位；还有一种是从撤销单位来的，如照这个规定办，又回到待分配的单位，思想工作很难做。希望反映一下。

说完之后，几个人议论了一阵，还提到计划会议上余秋里的汇报提纲，为被“四人帮”诬为“三株大毒草”之一的“工业二十条”正了名。吴庆彤建议政研室就《论总纲》写个报告或写篇文章澄清事实。于、邓还提出政研室要写一个结束工作的请示报告。

## 在“批邓”运动中 胡乔木动摇不是小问题

吴庆彤在与于光远、邓力群和胡绳谈话时，说了不少关于胡乔木

的话。大意是：1、胡乔木在政研室做了些好事，但运动中有动摇。那时他动摇不是一个小问题。他给毛主席写信，送去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内容还有不实之处，邓小平莫明其妙。2、他（胡）写那个东西（指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政研室不能负责，由他自己负责。3、那个东西交上去，大家都得承认刮右倾翻案风，很被动。如果他顶住不写，我们的情况会好得多。4、“四人帮”的问题出来后，他可以好好地揭发，他知道的情况比我们多得多；可以做检查，但他没有做，好像觉得不需要检查。

吴庆彤讲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动摇，运动结束后又不检查，事实确是这样。回想一下当时情况，胡乔木在那次运动中，没有顶住压力，在大小会上多次揭批邓小平。比较集中的是1976年2月23日在政研室全体大会上的揭发交代。这次讲得很多很长。第一部分是划清他与“最大走资派”邓小平的界线。这部分中的第一个问题，讲的是政研室的任务和组织问题。关于政研室的任务，按照他的“交代”，政研室是最大走资派邓小平提议成立的，但邓没有明确规定政研室的任務，他（胡乔木）说，“我认为，这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政治研究室被他（邓）和他的追随者我（胡）利用来刮右倾翻案风有很重要的关系。”按照胡乔木的这个说法，似乎邓小平提议成立政研室就是要利用它来刮右倾翻案风。他说，邓小平原来提出的研究理论问题，写反帝反修文章等等，“实际只是一个骗局”。关于政研室的组织，他揭发邓小平不执行毛泽东的老中青三结合原则，不接受他提出的吸收一些革命造反派参加政研室领导的建议。他说：“我无论在政治路线还是组织路线上，都忠实地执行了他（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我当时听了他的这些揭发交代，还认为他是在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做的。后来才看到吴庆彤所讲的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和送去的《揭发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在这份材料中，他排日期、按顺序一条一条地揭发交代邓小平同他们谈话的内容，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关于这个揭发材料，当时许多干部都知道，而且也知道邓小平谅

解了他。但是又都不大清楚。有的人说是 23 条，胡绩伟的文章说是 14 条，其实是 18 条。这个材料，内容很多，这里篇幅限制，不便一一列举。总之，胡乔木送给毛泽东的那份揭发邓小平的材料，较之在政研室批判大会上讲的更系统、更具体，一再说他搞政研室是受邓小平的欺骗蒙蔽；对于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整顿科学院的意见，说是邓小平为了在科学院刮右倾翻案风而造的谣言，是邓的“无耻捏造”；说邓在一次谈话后吃饭时，讲起有人说什么复辟、还乡团。邓小平对这种话“虽没有说什么话，但俨然以复辟、还乡团自居，并对我们（胡乔木等）进行毒化宣传。”等等。这个揭发材料对邓小平无限上纲，扣大帽子，骂邓小平“既顽固又虚伪”。照他说来，邓小平不仅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恶毒攻击毛泽东、分裂党中央，复辟资本主义，连品德也成了问题。他把邓小平说得如此不堪，批得那样狠，党内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如吴庆彤对他是很不满、很气愤的。所以，政研室在撤销前人人作鉴定，却不包括胡乔木，要他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四人帮”的问题出来后，他没有做检查。吴庆彤在这次谈话中批评了他。<sup>①</sup>

## “照他们的报告办” “来个精采的结束”

这次谈话后，于光远找林涧青等几个人写了《关于政研室结束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胡乔木、邓力群修改和胡绳看过后，由于光远、邓力群署名，于 3 月 18 日上送李先念、纪登奎。请示报告主要内容有五点：第一，结束运动还要办五件事：①“三株大毒草”的问题要解决；②“四人帮”诬陷政研室的问题要澄清；③对农伟雄（国务院政研室造反派头头）要在揭发批判的基础上作出结论；④对赵×

---

<sup>①</sup> 本文在《百年潮》2000 年第 3 期发表时，为不使该刊为难同意将以上这段文字删去，现在恢复。——笔者注